

生命意识的书写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主题解读的一个侧面

■ 罗伟文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中充斥着生命意识的刻意书写,它们汇聚成了当代文学中壮观的生命大潮。本文对这一生命大潮凝聚成的主题群进行分析,力图剖析当代小说中人的生命意识探索的历程和特点。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中奏响的生命旋律,加深了文学对人自身的认识。

[关键词]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生命意识;书写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5)07-0137-04

罗伟文(1968—),男,江西临川人,文学硕士,集美大学中文系讲师。(福建厦门 361021)

生命意识是文学书写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的文学家穷尽其智慧探索生命的存在和奥秘,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重要资源。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小说中则充斥着生命意识的刻意书写,作家们在情感和哲理交融的艺术世界中,细腻执着地展示着生命的深沉与博大,它们汇聚成了当代文学中壮观的生命大潮。对这一生命大潮凝聚成的主题群进行理性的分析,可以把他们分成三个基本方面:一是精神生命的理性张扬,二是对生命本体的执著探寻,三是对消极生命意识的不懈言说。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中奏响的生命旋律,既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学“人”的主题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文学对人自身认识的深化。

一、精神生命的理性张扬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中期,小说对人的生命观照主要集中在人的精神层面。这场引人注目的生命书写源于人道主义思潮的推动,“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1]刘再复在 1986 年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上,就曾以人道主义概括截止当时

为止的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人道主义的首要命题是关注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与这一思潮相应和,文学中喊出了“大写的人”的口号。主体的觉醒和个性的呐喊,使人的自我获得极大的解放和突显。因此,作家们精心建构了人的自我神话,并满怀激情地对人的生命进行了形而上的理性思索,文学的审美视域自然集中在对有生命的个体进行理性思考的层次上。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中期的小说作品,着力探讨和张扬的主要是人的精神生命。在这类作品创造的生命世界里,作家力图从精神的意义去认识人、表现人,从而探寻生命的活力朝气。这种探寻有两个重要的叙述策略:一是对死亡言说的热衷。通过对死亡本身的直接思考,展现人们对生命的理性思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生与死”时曾指出:死亡“要么留下某种生命的原则,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原则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2]。作家们在直面死亡时,因融进了一种生命原则而使死亡成了对生命意义的肯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便是这种生命原则的集中体现。这种把死亡纳入生命之中,并把它视作

生命辉煌最终完成的思想,强调的无疑是人的生命自觉性。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等“拓荒者”,他们的死亡便给人一种精神能源,给生者以人生视野和境界的升华,充满了精神永生的豪情。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靳开来们为国捐躯,但他们是虽死犹生的烈士,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作家们对这些人物的悲壮捐躯,赋予了一种在精神中永生的观念,表明了作家对精神生命的激情礼赞。二是对大自然的诗意向往。在大自然的观照下,获得生命的启示,显示生命的昂扬。因为大自然那神秘的自然葬力,是人的生命强悍的直接证明。一些作家在大自然宏大的背景下,塑造笔下的人物,考验他们的意志,迸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邓刚《迷人的海》正是在大海的本性与人的生命天性的相通中,试图通过大海的神秘莫测、桀骜不驯,召唤人的生命精神。张承志《北方的河》则在北方大河的喧嚣轰鸣中,让人感受到主人公体内奔涌着的一种永不枯竭的创造活力,充盈着大河一般的豪情。“在他年轻的眼睛里,黄河象北方大地燃烧的烈火,对岸山西境内的崇山峻岭也被映红了,他听见这种神奇的火河正在向他呼唤”,表现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和进取精神。《黑骏马》赞叹草原赋予“我”的生命强力,“它拥抱着我,融化着我,使我习惯了它并且离不开它”,在自然的生命中,确认了自我粗犷的生命。这种探索还表现在孔捷生的大林莽、李杭育的葛川江、刘舰平的青浪滩等一系列作品中,通过自然的人格化,在人与自然的搏击中呈现自身的价值,展现生命的强健。这些积极的人生精神汇成一曲壮丽的人生交响曲,生命意识在与自然的搏击中得到了肯定与张扬。

可见,这类作品思考生命时,大都赋予了作品中人物“无我”的生存姿态,他们的生命存在和价值体现在理想、事业的搏击中。作品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生命情怀,充满了自我奋斗的精神性色彩,体现了生命的蓬勃激情。关于激情这一核心词,有研究者曾指出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它“是一种达抵极致的生命状态,是一种饱和的、昂扬的、亢奋的情绪”,它是“由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态度所导致的一种情感形式,是与‘憧憬’、‘浪潮’、‘燃烧’、‘沉醉’等一系列单词相联系”。^[3]把握激情的这两个特征,是我们解读这类作品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这场充满激情的生命书写,有着社会环境和作家主体的双重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人民反思“文革”这场灾难点燃了一盏政治明灯。许多作家纷纷抛开外在因素的束缚,重新思考生命的本来意义和价值。他

们深信历经劫难的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踏上新的历程。“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呼叫喊声中被淹没。”^[4]张承志的这一独语既是这类作家创作心态的表白,同时又是他们探索人的生命的内在动力。

二、生命本体的执著探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部分作家对生命的言说则深入到生命深处的本能之中,重在对生命本体意义的发现和探寻。所谓生命的本体意义,是“指生命不再只是作为人的社会存在,道德和社会命运的现象来理解,而是就其自然存在,在宇宙间的普遍性现象来理解”^[5]。也就是说生命蜕尽了它的一切外在因素,而还原为它自身最朴素自然的存在形态。因此,作家关注生命本体自身,且“潜入到生命的深层天地中去窥探生命存在的奥秘”。这场感性生命洪流的探寻显然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影响。非理性主义思想家们表现出对传统“人学”观的根本怀疑和反叛。他们认为人的真正本质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和生存欲望,即个体生命意志。柏格森则断言人的本质是一种盲目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冲动。而弗洛伊德则揭示了无所不在的性本能,且认为它是推动历史和文明的创造性杠杆。非理性主义对人所作的生命化理解及对性本能神奇威力的揭示,为作家理解人提供了一把钥匙,使他们对人的理解和生命之源的开掘转向了人的意志和本能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作家,在作品中展现了一个个生机勃勃充满感性生命活力的人物。他们推崇和礼赞个体身上普遍存在的生存意志,在生存意志的强力中爆发出不息的生命之源。苏童在《青石与河流》中塑造了一个强悍而有血性的生命体。欢女忍辱负重,旺盛的生命力永不枯竭。她命运多蹇,生命充满阴云,但终于斗垮了最强的男人,“她脸上凝结着世上罕见的美丽的神情”。这是一个弱女子唱出的生命欢歌,体现了不屈的生命意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对爷爷、奶奶蓬勃的生命方式进行的歌颂,无疑刮起了一道生命旋风。戴凤莲与余占鳌的生命汇合,点燃了她生命之火。在涌动的生命潮水里,她疯狂地啜饮生命自由的琼浆,“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这是一个泼辣强悍女性的宣言。《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在萧萧秋风中光着脊梁骨,用抑郁的大眼睛望着人们的黑孩,他那绵长的生命力令人赞

叹。作家在对生命强力的礼赞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人的生命意志才是世界的真实,才是人生的真谛。只有肯定生命意志,才能获得不可穷竭的生命强力,才能成为生命力充盈的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部分小说对生命的探索还深入到人的性本能之中,执着地呼唤人的野性生命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性与生命、生命力相连,并将性作为生命或生命力的象征来进行讴歌。因为性是生命的最原初动力,是生命的直接形态。作家以性作为认识人的一个聚焦点,揭示人的发展和异化,思索人的历史演进,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而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涉性作品,主要是歌颂精神的交融和心灵的守望。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讴歌了一种精神之恋,主人公只有精神上的爱慕而无性的冲动。贾平凹的《黑氏》表现了超越性爱之上的灵魂的相濡以沫。《天狗》颂扬了天狗的精神魅力。天狗对师娘一往情深,但他的灵魂中却不存在狭隘的生物性占有。这不仅是一种人道的克制,更重要的还是对美和善的一种朝圣。另外,有的作品则通过性来鞭挞摧残人性的社会现实和落后的文化,呼唤人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抨击传统习俗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爱情悲剧。扬克祥的《玉河十八滩》揭示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残酷的饥饿条件下性与食的交换。在这些小说中,通过以性为焦点来写人,性的言说有着明确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目的,渗透着深厚的人道情怀。而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则把性作为感性生命力加以弘扬,使文学中人的生命意识真正体现了生命本我的冲动,弥漫着原始生命的野性力量。晓剑《玫瑰与宇宙之筏》描写的即是一个山寨的原始民族的男男女女的生命冲动。这个山寨所有人的性,都表现自然而无所顾忌,性的生命力成了促使男女结合的强力。洪峰的《翰海》在荒原翰海里生命与自然蛮力的结合中,试图找到生命存在的隐秘根源。《生命之源》则在封闭的生存环境里,赤裸地展示出生命的本能冲动,人的生命与狼的生命相映照,凸显人的本能强力。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系列人物,形象魁伟美丽,性情狂悖,带着浓烈的豪情气息。而性爱则是他们的生命熊熊燃烧。《红高粱》中的爷爷奶奶充满了野性和生命活力。他们在高粱地里那次浪漫的野合,是野性生命的激起闪现。这些敢于承受生命大苦大乐的生灵,展现了自己生命的全部真谛。作家们高擎生命的旗帜,由衷地赞美了那饱含着感性和本能的生命力量。他们对生命本体

的崇拜,显示出人的强劲创造本能和生命伟力。表达“人是生命”这一主题,是这一时期作家对人的探索的重要贡献。它使文学对人的生命观照从人的精神层面转向了人的自然本性,从而深化了文学对人的认识、对生命的思考。

三、消极生命意识的不懈言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生命言说,有一个引人注目和让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消极生命意识在文本中的大量出现。消极生命意识作为人的生命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类。而文学对它的言说,无疑显示了作家对人自身复杂性的探寻。然而,消极生命意识在文本中的泛滥,则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氛围。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心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生存现实,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孤独、悲观、荒诞的世纪末生存体验。这种具有世界感的情绪体验激活了作家的感受力,也为作家接受非理性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提供了一种先在结构。在存在主义哲学启悟下,部分作家找到了对人、对世界的新解读。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人的存在就是烦”、“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因此,一些作家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重新思考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并且着力体验和展现了一种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生命意识。这类小说的生命思考可以归纳为两种核心状态,即生命的荒诞感和生命的被抛感。

(一)生命的荒诞感。“荒诞”一词具有鲜明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色彩,它源于存在主义,是一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审美概念。它是指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一种反常而不合理现象。存在主义认为,整个世界到处都充斥着荒诞和无意义,“世界对我来说则已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不过是一种无根无据,荒诞的赝品罢了”(尤奈斯库《起点》)。这是存在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在这一思想的启悟下,部分作家在观照人与世界时,发现了人与世界的新解读。他们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命存在状态和生命体验,并且对这一生存体验进行了反复的言说。徐星《无主题变奏》中的老 Q,生命对他来说是充满不可理喻的荒诞。“我搞不清楚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是我不等待什么。”充满了人生的虚无感和失落感。陈建功《卷毛》中的卢森是被抛到荒原的失意者,他玩世不恭,时刻感到人生的无聊和荒谬。王朔的创作成了荒谬人生的实

录,他笔下的玩主们是不存在什么明天的,而没有明天的生活就是荒谬的生活。残雪的小说更鲜明地写出了人生的荒诞,在她的意识深处,舞蹈着的是人类生存荒诞的黑色精灵。《山上的小屋》就是通过小说中“我”的感觉写出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隔膜和对抗。残雪以梦言谰语描画的荒诞世界中,暗示了人类生存的荒诞色彩。这些作家对人的生命的荒诞体验,揭示了作家对人与世界的非理性理解,它的实质是以一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个体存在的生命状态。他们笔下的人物没有乐观的理想精神,也没有昂扬的激情,而是对现状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与忍耐。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作家对生命的荒诞体验是东方式的,是现实与哲理的融合。作家既立足于中国现实,思考人生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又有冷静的哲理思考。也就是说,这种生命的荒诞体验不是人类所固有的,而是和不合理的现实密切相关。因此,他们所体验到的生命无意义感和自我怀疑,是在现实坚壁挤压面前而滋生的一种生命颓废心态。

(二)生命的被抛感。海德格尔曾规定,烦就是人的存在。而被抛即指此在为烦所抛而又不断地抛入烦之中,人就是这样不断的被抛入烦事之中而不能自拔。部分作家正是在世俗生活的纷扰中展示了芸芸众生无穷无尽的烦恼。池莉《烦恼人生》以生活流式的叙事,诉说了印家厚在生活重压下疲惫困顿的心灵。窘迫的住房,艰难的上班行程,纷扰的人事纠缠时刻困扰着他。作品在苦涩的现实中,点明了印家厚日常生存中的种种烦恼。叶兆言的《艳歌》以日常的身边琐事展示迟钦亭的生存境况。夫妻俩为拥挤的住房、经济的拮据而争吵不休。找保姆、带孩子、维持家庭生计等生活琐事,使迟钦亭在生活的琐事中纠缠不休,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和喘息。“三十功名尘与土,镜中衰鬓已先斑”,迟钦亭只能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暗自咀嚼生活的苦涩。刘震云的《单位》则揭示了官场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中给人带来的无尽烦扰。这类小说在世俗人生的原生态展示中,把焦点对准了芸芸众生,展示了他们生命中的种种烦恼。作家们在展示生命的过程中,是把烦恼放在人的生存窘境这一背景下来进行审美观照的,意在表现人的生命窒息感。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作家们把这种生存窘境转化为对生命的情感体验——烦恼。把笔下的人物放逐到漫漫的生命旅程之中,让他们肩负起沉重的生活行李,品味着这旅

程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走下去,走下去”^[6]。这走不完的烦恼怪圈深刻揭示了当代人生命日渐窒息的无奈和悲哀。“这悲哀犹如一声叹息,在茫茫苍穹缓缓流动,那么虚幻又那么实在,有时甚至让人留意不到,值不得思索,但他总有一刻使人感到不胜重负。”^[7]池莉的这段话正是当代人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可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掐灭了人生的理想、信仰,他们过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是好”的消极、被动生活,生命在浑浑噩噩中放射着灰色的色彩。

黑格尔说过: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他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20世纪80年代的短短十年,走过了西方整整一个世纪的探索历程,再加上文学对人的生命意识探索本身就深刻而复杂。因此,科学而深入地陈述这一探索的脉络和对“人学”理论的影响,是研究者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对人的生命意识探索并没有给文学中人的形象增添更多的光辉和伟大,特别是消极生命意识的泛滥值得人们警醒。因为,文学对生命的探讨是为了达到对“生命的明悟”,是“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8]仔细品读沈从文的这番话,我们觉得这一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创作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再复. 新时期文学主潮[N]. 文汇报, 1986-9-10.
-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297-298.
- [3] 曹文轩. 激情与叙事——新时期文学心态寻踪[J]. 文学评论, 1997(1): 68-76.
- [4] 张承志. 北方的河·引言[J]. 十月, 1984(1).
- [5] 吴予敏. 论新时期小说的母题及其文化价值观念[J]. 小说评论, 1998(5): 3-10.
- [6] 张学军. 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303-304.
- [7] 池莉. 我写《烦恼人生》[J]. 小说选刊, 1988, (2).
- [8] 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118-119.

【责任编辑 莉 茹】